

# 交易成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符号

胡 进 杨尧忠

## 一、两类成本与两类财富形式

人类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物质财富增长与物质财富易于分割和流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追求高效率、低成本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开展了两个方面的经济活动:一方面是与物质世界打交道(学称“人与物的技术关系”),另一方面是与人打交道(学称“人与社会的关系”)。相应地,在每种经济活动中,我们的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某项经济收益,最低限度地支付一定的成本。在与物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获取的是一定的物质产品,支付的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财、物的耗费,即生产成本;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取的是一定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交易量,同样要支付一定的人、财、物的耗费。这种在交易过程中的人、财、物的耗费,就是由美国著名学者科斯教授首先提出经后人不断引伸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含义今天已相当宽泛,其基本含义是:“为达成一项交易,做成一笔买卖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所买卖的那一种商品的价格不在其中,运输费、商品保管费等也不在其中)”。交易成本概念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系统是一个耗散系统,从动态角度看,交易成本渗透到交易活动的全过程中,从交易前的搜寻,到交易中的讨价还价,再到交易后的监督都是交易成本的表现形式,总之,交易活动的每一步运作都是要花费代价的。

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反映着人类经济活动的两方面的基本经济关系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共同目的,即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和更加润滑的经济运行机制。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为降低这两类成本的不懈努力,促使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如果说,人类在与物质世界打交道过程中,生产成本的每一步大幅度降低,都伴随着生产过程中效率的巨大提高,产业的步步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的更替与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那么,人类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每一步大幅度降低则是在流通领域效率的巨大提高,市场机制更加润滑,社会财富分割、流动、重组更加容易,更加方便。但是,降低两种成本的努力却形成了两类不同的财富形式:生产成本巨大降低促进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的增长;交易成本巨大降低,则是促进了社会价值形态财富形式——金融资产的形成为巨大增长。所谓金融资产就是在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商品,或者各种债务凭证或所有权凭证,如:支票、汇票、债券、股票、存款凭证、外汇、期货、期权以及其他可转让的证券。它们自身并无价值,只是相应实物资产的价值符号或“纸制副本”。无疑,交易成本发生在人与社会关系的交易活动中,揭示的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密切相关,生产成本降低迫切需要交易成本的降低。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真实并且重要。实际上,由于制造过程的革命(诸如生产流水线的发明)使生产成本降低,交易成本越来越重要。”因此,金融资产(经

济符号)是为实物资产顺利运转服务的,它们的形成与发展,就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必然现象。

从理论上讲,交易成本乃与生产成本相关,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对称。然而,在现代货币经济中,追求低交易成本的强烈冲动,使金融资产(经济符号)与实物资产之间并非完全对称,金融资产发展规模已大大超过实物资产的发展规模。如果世界财富结构是由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构成的话,那么这个财富结构就必然是“倒金字塔形”:塔的最下端,即塔尖部分为第一层,它表示世界实质性的物质生产及产品;往上第二层为世界商品和真实的服务贸易;第三层次是通货、股票、债券、存款凭证等各种金融资产;第四层次为商品期货,金融期货及各种金融衍生商品。显然第三、四层次的规模要比第一、二层次规模庞大的多,这就使得世界财富价值构成极不对称,整个经济系统运行极不稳定。一种原本为实质经济系统运转服务的符号经济系统却超过了实质经济系统本身的发展,并成为干扰实质经济系统顺利运转的不稳的内生因素,这是人类在降低交易成本过程中始料不及的事。

## 二、经济制度与经济符号

交易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们的有限理性、机会主义行为、未来不确定性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完全性等因素的影响必然在交易活动中形成交易成本。同时每一种交易形式必然对应着一种交易合约或制度安排,不同的交易合约或制度安排会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因此,正如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降低有赖于技术进步一样,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降低则有赖于合约安排或制度的创新。人类为降低交易成本总是在不断的探寻各种有效的合约形式或制度安排,货币交易与货币制度、信用交易与信用制度就是人们在这方面所做努力的体现。这两种重要的经济制度以及它们自身的创新为经济的运行建立了“一种秩序,一种环境,一种使资源合理配置与流动的导向、润滑与调节机制”,因而可以在节约社会交易成本的意义上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同时,也正是通过这些经济制度逐步产生与发展起了日益庞大的经济符号系统,使经济生活日益“符号化”。具体地讲,就是通过货币形式的符号化与信用形式证券化来产生与发展经济符号系统的。

### 1. 在货币制度层次上产生经济符号

人类最早从事的与人打交道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商品交换活动,这一活动是商品所有权关系的转换和变更,它们必然涉及到搜寻、讨价还价与扯皮等交易成本问题。在货币产生前的物物直接交易制度下,经济世界不存在符号,一切均以实质经济为中心,但交易成本高,效率低。物物直接交易制度的高交易成本特征既阻碍了商品流通,也妨碍了生产领域效率的进一步提高。使交易成本降低的强烈冲动,使货币从商品母体中挣脱

出来。

货币的出现是流通领域的一场革命,是一种效率创新。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统一了价值尺度,减少了扯皮问题,节省了社会计算比例的时间和精力,简化了簿记制度;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克服了“需求双重巧合”和“时空双重巧合”的障碍,从而使商品和服务的交换以最低成本或最高效率的方式进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为商业活动中的延期支付,以及工资、赋税、地租等的支付提供了便利;货币作为贮藏手段,方便和丰富了社会成员的财富贮藏。总之货币交易制度下的交易成本被极大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效率获得极大提高。

货币交易制度通过货币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也为经济生活注入了最早的一枚经济符号——货币。首先,货币作为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在计量其他商品价值时更多只是观念上的或想象的,这就使货币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符号特征。其次,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也在社会交易和流通的蒸发器中不断被蒸发,逐步经历了从商品货币(足值货币)到代用货币,再到信用货币(价值符号)的演化历程。这一历程实质上是货币的纯价值体(即一般等价物)与货币的物质价值体逐步分离的过程,同时也是货币形式即货币的物质价值体的逐渐虚化,直至符号化的过程。

推动货币形式符号化的因素有二个方面:一是货币天生具有游离实物之外与符号化的倾向。货币作为交易手段,打破了实物交换对称关系,使买卖统一过程裂变成先卖后买的两个独立的环节,形成了货币与实物关系,即社会经济总流程开始形成实物流与货币流。从功能上讲,货币流为实物流服务,但实际上“货币流并不是实物流有始有终的忠诚伴侣。”当货币完成一次实物交易后,并不随实物退出流程,而是继续在流程中充当交易的中介,这就使货币本身有一种游离于实物之外的倾向。同时,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再是消费的对象,而是转瞬即逝的交换中介,人们关心的不是货币实体本身,而是它的购买力。只要货币的价值稳定,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既可以是货币商品实体(如实物、金、银等),也可以是不足值的价值符号(如银行券、纸币)。因此,人们常说:“价值符号正是货币执行流通手段功能的产物”。二是货币符号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货币的出现,特别是铸币产生时,它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制度的烙印。所谓货币制度,简称币制,就是一个国家以法律形式所规定的货币流通的组织形式,其核心内容是确立什么币材作本位货币,即表明以什么样材料作为标准货币的币材。当货币在功能上由商品货币蜕变成信用货币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时,货币制度的安排则使货币符号化成为事实。现代信用货币的运用便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制度的力量。所谓信用货币就是发行机构向社会开具的一种纸质信用凭证,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仅是一种凭借信用和法律强制力而能流通的价值符号。现在广泛使用的M<sub>1</sub>层次即狭义信用货币就是由纸币和银行活期存款两项组成的。纸币只有一个价值极低的纸制外壳,银行活期存款则连物的外壳也没有了,完全是银行存款帐户上的数字,而且其数量占整个交易量的80%~90%,电子货币与网络技术的出现,使货币形式进一步演化成数字脉冲,货币交易变成了网络之间的数据信号的传输。尽管,现代信用货币符号性的使用没有改变货币的本质即一般等价物,但货币在形式上,已完全成了一种观念上的经济符号,并且不可避免地加大经济体系中货币流与实物流相分离的趋势。

## 2. 在信用制度层次上扩展经济符号

货币的运用为商品和服务交易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机制,货币流的信息功能(如价格、利率、利润、收入和汇率等)对社会经

济循环流中的盈余部门与赤字部门之间资金余缺的调剂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货币交易方式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市场交易中的所有阻尼因素。而且,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不仅要求高效推进一般商品交易和资金流动,而且要求合理分割、流动和重组产权;不仅要求增量资产的合理配置,而且要求存量资产流量化;不仅要求经济纵向联系,而且要求经济的横向联系,这样复杂的交易关系,显然是货币手段难以实现的。建立在诚信原则基础上的现代信用制度为日益复杂的交易关系提供了新的合约形式或制度安排,它的基本机制就是创造各种可交易的证券合约(直接的和间接的)来调节资金余缺和规范资源配置中需求双方的产权关系。

证券合约,亦称信用工具是具有一定票面价值、证明财产所有权或债权,并能在市场上流通转让的标准化的契约证书。较之于货币,证券在更大程度上节约了社会交易成本,创造了更为方便的资源配置机制。首先,证券作为财产的产权证书,事先就用书面形式规范好了资金需求双方的产权关系,一旦证券这种金融商品在金融市场上实现了其销售,买卖双方就是对契约证书上所规定的产权关系的默认,并且必须遵守。这就减少了因产权不明确而带来的扯皮问题,从而有利于产权的高效运行。其次,证券作为融资工具与资源配置工具的统一,具有裂变复合财产所有权的功能。运用这一功能可以把物质属性上不可分且在位移上受时空限制的经营财产实体裂变为可进行代数加总和可不断流通的基本单位,同时,又能把分属于不同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所有权进行复合组成财产所有权的复合体——公司制企业。这种功能无疑满足了现代企业制度和整个市场经济对产权能合理分割、流动、重组的要求,对于存量资产的流量化与进行经济横向联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证券作为财产产权的“纸制复本”,则在更大程度上扩展了经济符号。

首先,证券的符号性更强。货币是在社会交易和流通中逐步符号化的,而众多的信用工具是资金的需求者(赤字部门)为融通资金发行给资金供给者的产权证书,因此,它们一开始就是以最直接的价值符号身份出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证券资产的天生符号性进一步加大了符号经济流与实物经济流分离倾向。一方面,证券使财产所有权表现为双重存在,即既表现为客体存在的物,又可以表现为法权形式的证券,并且使所有权的运动及其权益的实现可与客体的实际运营相脱离,从而形成了证券流与实物流。二是在证券流运动中,不仅与实物流运动有关,而且与社会经济心理等因素有关,从而使证券流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相对独立运动。

其次,证券符号性涉及面更大。信用工具是数量众多、品种复杂的庞大经济符号家族。当货币使经济运行呈现符号化趋势时,它们则使这种符号化得以全面扩展和放大。的确,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符号已深入到社会经济运行的方方面面:从普通零售到大宗贸易,从一般资金融通到宏观调控,从财富贮藏到资本运营,无一不是借助经济符号来运作的,从而在人与社会关系中构筑起广泛的证券经济关系,并深深地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取向,正如张建伟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整个经济世界被货币、股票、债券、外汇、期货、期权合约等象征性的符号所占据。曾经为先民们所顶礼膜拜的‘土地’,曾经被古典经济学家所歌颂的‘劳动’,日益被更加令人眩晕的货币、证券合约等符号所代替。正是这些符号日益左右着当代人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文化生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证券系统是一种最赋有创新功

能的符号系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符号虽然挣脱了金属货币的约束,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国家法权制约;而证券不仅摆脱了实质经济约束,而且大体上也不受国家法权的制约,证券完全成为现代信用(尤其银行信用)任意创造的产物,从而使证券品种层出不穷,证券的数量以超过实物经济增长规模的速度增长。例如:可转让定期存单(CD<sub>s</sub>)就是银行机构为吸引大众资金来源而“设计”出来的一种在到期日之前随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的银行定期存单,而CD<sub>s</sub>自身又在“金融工程”运作下不断翻新,从而裂变出可变利率可转让定期存单、滚动利率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可见,证券已经成为“金融工程”设计家们创新的杰作了。不仅如此,在金融创新制度下,信用工具的融资功能已发生蜕变,它们的派生形式——金融衍生工具,如远期合约、期货、互换、期权合约以及把这些合约加以组合的交易工具,不再具有其原生态信用工具的融资功能,而完全演变成了避险与投机的工具。它们成了“虚拟资本”的再虚拟,“纸制复本”的再复本。它们的运动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资本的运动,完全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运动。

### 三、结束语

现实经济世界是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充满了与人扯皮或被人扯皮等阻尼因素。降低交易成本就是降低阻尼,减少摩擦为商品和服务交易以及资源配置提供方便,这已成为人类在与人打交道的经济活动中的永恒主题。为追求便利与效率,人类总是在永不停息地进行制度创新,先是货币制度,继而是信用制度以及其证券化形式。制度创新的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经济运行机制更加润滑;另一方面是经济符号不断生

成。无疑,符号经济系统服务于实质经济系统。因为,实质经济系统是“物”,符号经济系统是“像”;“物”是基础,是主体,“像”是复本,反映“物”。然而,由于经济符号的虚拟性,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经济符号系统的二重效应:既依附于实质经济系统,又游离实质经济系统;既服务于实质经济系统,又扰乱实质经济系统;既是实质经济系统的“福”,又是实质经济系统的“祸”。如何发挥经济符号长处,抑制其短处,则是在与人打交道的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中亟待解决的课题。

#### 注释:

- 樊纲:《走进风险的世界》,178、175页,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5。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48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凌江怀:《实物经济与符号经济的背离》,载《经济学动态》,1998(6),45页。  
邓乐平:《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实证的考察》,4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周晓寒:《金融经济论》6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李方:《金融泡沫论》,6页,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  
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4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  
张建伟:《“泡沫”符号与“德鲁克第三命题”》,载《经济学消息报》,1997(32)。

(作者单位:荆州师范学院经济系 荆州 434100)

(责任编辑:金萍)

(上接第17页)应当并且必须进行公有制形式的重大变革从而重构公有制模式的新观念。

(2)在理论创新方面,应当实现两大突破与创新,一是必须突破以往认为公有制必须并且只能是劳动群众共同所有制的片面性的理论观点,确立劳动者个人联合所有制不仅是公有制而且是更现实、更合理的公有制模式的新观点;二是必须克服以往完全否定与排斥劳动者个人产权、把劳动者个人所有权完全地等同于私有制的简单化的理论观点,确立劳动者个人产权既是公有制的应有之义又是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因而是天经地义的新观点。

(3)在公有制改革思路方面,必须改变以往只是在原有公有制模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去寻找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新的实现形式(即寻找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新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改革思路,确立公有制改革应当并且必须进行公有制形式的重大变革,在新的公有制形式的基础上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公有制模式的改革思路。根据这一新的改革思路,在今后公有制改革过程中,应当把大部分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通过股份化改造与实行股份合作制等改制方式改变为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不是国有股份制、国有控股公司等假股份制和“翻牌公司”。

(4)适应构造市场型公有制模式的客观要求,今后公有制改革的重点不应当是调整或规范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而应当是全面确立劳动者的个人产权,使广大劳动者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即股权,实现“劳者有其股”<sup>41</sup>并且,在实现劳动者个人财

产权的同时,实现劳动者个人所有权的社会化,其主要形式与基本途径就是在广泛实行规范的股份制的同时,大力推行以劳动者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为基础的股份合作制。

#### 注释:

- 桂世镛:《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载《经济日报》,1998-11-26;程恩富等:《国有制实现形式的发展变化》,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2)。  
卫兴华、黄桂田:《论改革过程中公有制的地位和前途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96(1);宫希魁:《努力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载《中国改革报》,1997-08-07。  
宫希魁:《努力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载《中国改革报》,1997-08-07。  
乔传夫、李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载《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4(3);参见宫希魁:《努力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载《中国改革报》,1997-08-07。  
李太森:《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微观实现形式》,载《中州学刊》,1997(3)。  
王寿春:《当前我国公有产权蜕变现象剖析》,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9(4)。  
郭树清:《现阶段经济改革的若干战略问题及处理方式》,载《改革》,1993(4)。  
周明生:《关于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形式的深层思考》,载《经济问题》,1998(5)。  
10 卫兴华:《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论序》,载《当代经济研究》,1998(6)。  
11 参见王珏主编:《劳者有其股》,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 开封 475001)

(责任编辑:曾国安)